

書評回應

鄭 瑋 寧 Wei-ning Cheng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首先感謝趙彥寧教授與夏傳位老師的評論，以下簡要回應兩位的提問。

趙教授建議本文應分成不同課題進行裁剪、分篇出版，這涉及到研究者要如何在地方社會面對、處理與掌握「政治」這個課題，這涉及所謂政治在不同時代與不同政經結構下會有不同的性質與樣貌，甚至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會因此而有所不同。這篇文章是從政治人類學以權力性質來掌握政治生活與社會秩序運作這個基本關懷做為出發點，透過人觀、交換、情緒與權力概念在歷史過程中如何以不同方式彼此結合並運作，來呈現地方社會的政治生活及政治社群性。的確，情緒與情感是當代政治生活的關鍵面向之下，這篇文章主要聚焦在歷史過程中，權力關係與社會關係如何不斷連結到當地人特有的情緒表達及風格。必須承認，相對於情緒表達風格，前個人、前社會的情感雖然是可被研究的，但若要對地方社會中情感的感染力以及人被感染的過程有所掌握，很難只從口述或是訪談材料來趨近，這當然涉及到我認為研究者在事件中的感性（與對這類感性的掌握），對情感這個課題與情感政治的理論化是不可或缺且相對困難。事實上，我認為若要討論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作用與意義，必須從民族誌上與理論上同時去對人觀、主體與無意識等課題再進行各方梳理與反思，因此我將情感、感性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課題（如主體、無意識），留待新作品繼續處理。

對於我的文章似乎強調地方社會的政治的情緒基礎且似乎無視於國家制度或組織的硬性結構，夏老師提出了疑問。在此必須釐清的是，這篇文章延續了政治人類學以權力性質做為地方社會維持與理解前國家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秩序的切入點，國家化及相關的政治範疇之所以能在地方社會有效運作，是同時透過制度進行，更仰賴象徵化而發生作用，即，透過交換、親屬關係與道德性來轉變、合理化甚至掩蓋制度與權力的壓制甚至暴力。此外，在當地人歷經的國家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中，情緒在政治上

活與政治運作中的性質與位置，以及情緒、權力形式與人觀之間的關係，各展現了不同結合方式，並呈現出不同面貌。就此而言，主觀認識與象徵機制的討論，並不意味著忽略了國家做為結構性力量的客觀性，而是指出結構性力量究竟透過怎樣的方式而得以深入地方社會，並有效運作。更重要的是，在當代，國家的職能被金融資本主義與市場邏輯滲透，模糊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界線，並進一步牽連到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形塑。我以當地人自認為地方創生與社會企業的兩個個案來說明，金融化市場的邏輯與公司治理性的觀念，的確滲透到了國家對於地方社會治理的政策規劃，以及當地人希望透過「族群企業」以實現將來的「部落主權」這個想法，而金融資本擁有者對地方社會與偏鄉居民提供道德資本的作為，使得資本與市場邏輯不再是站在國家或地方治理的對反面，反而是確立了當地地方政治生活的面貌深深受到國家、市場與社會彼此挪用或相互裝配成的治理性所影響。

至於國家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關係，我承認自己對於近五年來的地方選舉並沒有更豐富的材料，只能補充說明自己對這個議題的理解：就我有限的觀察，影響原住民地方社會選舉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族認同」，這不只涉及情感政治，更涉及了殖民歷史的政經治理對原住民的無意識造成了深遠影響，但這遠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正因如此，我對於地方選舉的理解比較不傾向於政治社會學習於透過選舉策略與選舉結果，來論證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怎樣的轉變。關於論文使用的同歡（conviviality）的意義，恐怕不能只從中文字面來理解，Overing 與 Passes（2000）指出 conviviality 是出自以他人為念的前提，愛、忌妒、恨、無助等情緒，來表達人之所以相互吸引、在一起並彼此陪伴；若他人無法達成個人情緒需求而導致暴力相向等，乃是出自他們強調、重視與他人一起生活，共享同樣生活，並能生活得更好的原則，因此，同歡這個概念包含了夏老師所說的那些既衝突又親密、同仇敵愾等的情緒風格。再者，就文章中有關展演情緒的政治這個層面的討論而言，我的目的是要呈現：在為了聚落利益這個集體目標（獲得政府補助）之下，當地人認為展演特定的情緒風格是達成目標的有效方式。事實上，忌妒的情緒與權力欲望（及其黑暗面）主導了那些非關聚落整體利益的派系或個人的政治互動，或者說，在此層次上，情緒與欲望之力（puissance）的強度所展現的作用，更勝於情緒風格的展現。

參考書目

Overing Joanna, and Alan Passes (Eds.)

- 2000 The Anthropology of Love and Anger: The Aesthetics of Conviviality in Native Amazonia.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203184653

